

JIANG SU  
SHI LUN KAO

江苏  
史论考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K295.53

5

2

江苏省社联历史学会 编  
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# 江 苏 史 论 考

李金忠著

会 学 史 论 纳 通 道 著

研 究 所 史 论 纳 通 道 著

赠出书赠出书古董

本册印数 10000 册 1/32 开本 18.8 厘米 × 13.8 厘米 1/32 页数 140 页

印数 10000 册 10000 册 10000 册 10000 册

印数 1—5,200 册

ISBN 7-80218-121-4/K·65

元 0.00 宝 通 王 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**江苏史论考**

江苏省社联历史学会 编  
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---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     无锡春远印刷厂印刷  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5.875 插页1 字数340,000  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2,500册  
ISBN 7-80519-151-4 /K·62

---

责任编辑 王家鼎 定价：6.00元

---

## 编者的话

本书定名为《江苏史论考》，为江苏省历史学会和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，所收文章是近年来省内史学工作者对江苏历史、人物、专题研究成果的汇集。

省历史所作为地方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，在国家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一项省属重点科研项目，就是编写《江苏史纲》一书。在从事这一重点项目的研究和编写过程中，涉及到江苏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问题。为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，省历史学会与省历史研究所于1986年4月在扬州召开江苏地方史学术讨论会，总结和交流了研究成果。为反映这些研究成果，我们编辑了这本《江苏史论考》。

本书共收论文34篇，论列了江苏地区历史的各个方面，包括江苏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，如关于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发展、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、苏南与苏北经济发展的差距、明清江南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、江苏近代民族工业、左宗棠治苏政绩、张謇的“实业救国”与教育思想、大生企业与荣氏兄弟、邳睢铜抗日根据地、江苏解放战争的特点与全境的解放等等。有的文章依据出土文物资料、历史档案等有关文献，探讨了徐福东渡、西汉楚国、南京城成因、历代人口变迁、刘家港的兴废等问题，对中国历史和江苏地方史的研究，也都具有探索和开拓的意义。我们衷心希望这本书的出版，将有助于推进我省地方史的深入研究，期待着结出更丰硕的果实。

由于我们对江苏地方史的研究刚刚起步，我们的理论水平、专业研究水平有一定局限，因此，本书论述的一些问题以及所编选的文章中，必然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。我们诚恳地希望各地史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。

本书由王家典、许辉、蒋顺兴、徐梁伯负责编定。

江苏省社联历史学会  
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1987年7月

## 目 录

- 再论吴越同族 ..... 王文清 ( 1 )  
对吴国历史文化的新探索 ..... 萧梦龙 ( 19 )  
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考略 ..... 于锦鸿 ( 34 )  
西汉东楚地区的儒学文化 ..... 王家典 ( 43 )  
徐州狮子山兵马俑与西汉楚国 ..... 王 恺 ( 60 )  
南京城成因探源 ..... 季士家 ( 65 )  
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考察 ..... 沈嘉荣 ( 81 )  
南京历史人口的变迁及其原因 ..... 郭黎安 ( 94 )  
六朝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..... 许 辉 ( 107 )  
六朝时期江苏内河水运事业的发展 ..... 汪家伦 ( 126 )  
隋唐扬州历史二题 ..... 方亚光 ( 141 )  
从武宁镇看唐代方镇的两重性 ..... 刘希为 尤建伟 ( 151 )  
刘知几政治倾向及其对《史通》的影响 ..... 王春南 ( 163 )  
岳飞《金沙寺壁题记》问题及其研究 ..... 顾文璧 ( 179 )  
我国古代的刘家港 ..... 吴奈夫 ( 196 )  
明清时期宁镇常地区市镇研究 ..... 陈忠平 ( 213 )  
试论南明福王政权的倾覆 ..... 舒 翼 ( 233 )  
论明末清初苏松地区的棉纺织手工业 ..... 段本洛 ( 250 )  
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和江苏近代民族工业  
    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..... 倪正太 ( 267 )

- 左宗棠和徐州近代化煤矿 ..... 余明侠 ( 291 )
- 论左宗棠治苏的政绩  
——兼论清末地方大吏和社会经济发展  
的关系 ..... 徐梁伯 ( 312 )
- 南京工业近代化与国内国际经济局势之  
关系 ..... 林刚 唐文起 ( 326 )
- 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的苏北平民起义 ..... 吴菊英 ( 343 )
- 论张謇的“实业救国”思想 ..... 史全生 ( 354 )
- 张謇教育思想简论 ..... 陈乃林 ( 369 )
- 略论大生企业与荣氏企业的发展特点 ..... 陆仰渊 ( 383 )
- 奉系军阀在江苏的扩张及其失败 ..... 方庆秋 ( 398 )
- 论大革命时期的吴稚晖 ..... 李良玉 ( 409 )
- “九·一八”期间江苏学生的抗日爱国  
斗争 ..... 蒋顺兴 ( 424 )
- 刘少奇陈毅在海安 ..... 陈振东 范崇山 ( 441 )
- 邳睢铜抗日根据地史略 ..... 冯 治 ( 453 )
- 江苏全境解放纪略 ..... 孙宅巍 ( 465 )
- 江苏解放战争的特点 ..... 姜志良 ( 481 )
- 汤恩伯兵败长江 江苏全境获解放 ..... 丁永隆 ( 496 )

# 再论吴越同族

王文清

在《论吴越同族》一文中，笔者已从吴、越两国土著居民具有共同语言、共同地域、共同经济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特征，说明他们本是同族。现在再在这里说明他们同源于越族，形成为古代“百越”族系中的吴越族群。

## 一

持吴、越本不同族说的同志，一般都根据司马迁《史记》关于太伯、仲雍逃奔“荆蛮”、“自号句吴”的记述，判断住在今苏南地区的句吴土著人的部族“实为荆蛮族”，而与於越土著人越族不同。我们认为，从文献记载看，在周代不仅句吴的土著人被中原华夏族人叫做“荆蛮”，而且於越的土著人也被叫做“荆蛮”。

在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中，司马迁既根据先秦古籍记载了周古公亶父之子太伯、仲雍让国其弟季历逃奔“荆蛮”、建立句吴国的史实，也记载了周武王克殷以后封太伯、仲雍后代周章于吴和封周章之弟虞仲于故夏墟为虞侯的史实。他还说：“余读《春秋》古文，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。”这说明句吴的土著人在当时确实被称为“荆蛮”。

这个对吴国土著人的“荆蛮”之称，也作“蛮荆”。《国语·吴语》记载的黄池之会时晋国大夫董褐对吴王夫差的一段话，就是明证。董褐代表周王对夫差的告让之辞说：

昔吴伯父不失春秋，必率诸侯，以顾在余一人。今伯父有蛮荆之虞，礼世不续，用命孤礼佐周公，以见我一二兄弟之国，以休君忧。今君掩王东海，以淫名闻于天子。君有短垣而自逾之，况蛮荆则何有于周室。

这段话中的“蛮荆”，就是指的吴国土著人。

“荆蛮”既作“蛮荆”，也作“蛮夷”、“夷蛮”、“夷狄”。如《左传·成公七年》记载：吴伐郯，郯成，鲁大夫季文子因此说：“中国不振旅，蛮夷入伐，而莫之或恤。”就是说吴为“蛮夷”之国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既说吴为“荆蛮句吴”，又说吴为“夷蛮之吴”。《吴越春秋·吴太伯传》说太伯、仲雍“遂之荆蛮，断发文身，为夷狄之服”。《谷梁传·哀公十三年》则说：“吴，夷狄之国也，祝发文身。”

不仅中原华夏人对吴有这种鄙称，就是春秋时吴国的统治人物自己也有这样谦称。《吴越春秋·吴王寿梦传》记载吴王寿梦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时曾自称“孤在夷蛮”。《左传·哀公六年》记载吴王夫差时伍子胥也说吴国“介在蛮夷”。《说苑·奉使篇》还记载齐大夫出使吴国时，“吴人曰：寡人得寄处蛮夷之乡”。

根据以上这些文献记述，说句吴的土著人被称为“荆蛮”、“蛮荆”、“蛮夷”、“夷蛮”、“夷狄”是对的。但是，应该看到於越的土著人也是被这样称呼的。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就是把越王勾践叫做“勾践夷蛮”。《史记·东越

列传》也把句践后裔的东越、瓯越等叫做“蛮夷”。这也就是说，於越的土著人自周代以来和句吴的土著人一样被称为“荆蛮”、“荆夷”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《管子·小匡篇》记载齐桓公称霸时，宣称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……南至吴、越、巴、牂牁、麇、不庾、雕题、黑齿（注：皆南夷之国号也），荆夷之国，莫违寡人之命”。也正因为吴、越同属于“荆夷之国”，所以《韩诗外传》卷八记载楚人说：“越，夷狄之国也”。越王句践也曾这样自称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载鲁国派子贡出使吴、越时，句践自称越是“蛮夷之国”。《吴越春秋·夫差内传》则记载句践自称越是“僻狭之国，蛮夷之民”。这也就说明吴、越两国土著人同是“荆蛮”、“荆夷”、“蛮夷”之人。我们也就不应认为句吴土著人与於越土著人的族属不同，而应承认他们同族。

当然，判断吴、越两国土著人是不是同一族属，不只是看他们同被称为“荆蛮”、“蛮夷”，更要看他们的语言、习俗等是不是基本相同。在中国古代，“五方之民，言语不通，嗜欲不同”<sup>③</sup>。中原华夏族人认为“蛮夷反舌，殊俗，异习”，当然把“蛮夷”视为异族。有些“蛮夷”之人也承认他们在这些方面与华夏族人不同。例如春秋时被晋国迁到中原居住的姜戎首领，就曾对晋人说：“我诸戎饮食、衣服不与华同，货币不通，言语不达”<sup>⑤</sup>。姜戎当然与华夏族不同族。各地“蛮夷”之间如果言语不通，习俗不同，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同族。例如，楚国的一些土著人也被中原华夏族人叫做“荆蛮”、“蛮荆”、“蛮夷”，但他们与吴、越的土著人“荆蛮”、“蛮夷”却言语不通，习俗不同，我们就不能认为楚之所有“荆蛮”人与吴、越之“荆蛮”人同族。在

《论吴越同族》一文中，笔者已经说明了吴越两国人民“习俗同，言语通”了。这种“习俗同，言语通”，既表明吴、越两国的“同气共俗”，也表明两国土著人的族源相同。所以越国大夫种把吴王夫差举兵侵伐越国视为犯了第五个大过，说“且吴与越同音共律，上合星宿，下共一理，而吴侵伐，大过五也”<sup>⑥</sup>。

## 二

认为吴国土著“实为荆蛮族”的同志，还曾依据良渚文化与湖熟文化的不同提出一种看法。这种看法就是：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居民是“越族”，以宁镇地区为中心的湖熟文化居民是吴国的“荆蛮族”<sup>⑦</sup>。所以现在有些同志说：“早在3000年前太湖地区是属越族人聚居的地方，荆蛮人是聚居在宁镇山脉地区”<sup>⑧</sup>。也就是说，商代末年周太伯、仲雍逃奔荆蛮时，长江下游的江南有“越族”和“荆蛮族”两个族属。

我们认为，虞夏商周时代，长江下游的土著人，特别是江南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的土著人基本属于一个族系：“百越”即越族。

第一，太伯、仲雍所奔之“荆蛮”，是“夷越”、“蛮越”的别称。

《尚书·尧典下》记载虞舜有“蛮夷猾夏”之语。郑玄注曰：“猾夏，侵乱中国也。”《说文·爻部》：“夏，中国之人也”。地处中原东南方长江下游的吴、越就被列为蛮夷，正如史载：“唐虞国界，吴为荒服，越在九夷”<sup>⑨</sup>。周代以前，中原王朝规定“蛮夷要服，戎狄荒服”<sup>⑩</sup>。所谓

“吴为荒服，越在九夷”，就是说吴、越之人都是蛮夷戎狄之人。前面我们已经说明，吴、越之人是蛮夷戎狄，也就是说吴、越之人是“荆蛮”、“荆夷”、“蛮夷”之人。

周代中原人不仅称长江下游吴、越之地的土著人为“荆蛮”、“荆夷”、“蛮夷”，也对长江中游楚国土著人这样称呼。《国语·郑语》记载西周王朝末年的史伯说周幽王时，“当成周（今河南洛阳市）者，南有荆蛮、申、吕、应、邓、陈、蔡、随、唐，北有卫、燕、狄、鲜虞、潞、洛泉、徐、蒲，西有虞、虢、晋、隗、霍、杨、魏、芮，东有齐、鲁、曹、宋、滕、薛、邹、莒。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，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。”史伯在这里说的“南有荆蛮”，是指的楚国的土著人，也就是把楚国所有的土著人视为荆蛮戎狄之人。《国语·晋语八》记载春秋时晋大夫叔向说周成王时“楚为荆蛮”。在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，“荆蛮”作“楚蛮”或“蛮夷”。江汉地区的土著，也称作“江上楚蛮”。长江下游的土著“荆蛮”，又作“江蛮”。所以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说的“太伯之奔荆蛮”，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“太伯避历（季历），江蛮是适”。

这些被称为“荆蛮”、“荆夷”、“江蛮”或“蛮夷”的土著人，在夏代时期或臣服于中原的夏王朝，或与中原华夏族人有相互交战、迁移等关系。史载夏代初年，夏禹王治水平天下，“南为江汉淮汝，东流之注五湖之处，以利荆楚、干越与南夷之民”<sup>⑩</sup>。这里的“荆楚”即楚国，“干越”即吴越，“南夷之民”即“荆蛮”、“荆夷”、“蛮夷”之人。这些土著人在商周时期还分成许多方国部落，既被称为“荆蛮”、“蛮夷”，也被称为“夷越”、“蛮越”。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江汉之间的“楚蛮”即“荆蛮”中，就有称为“杨粤(越)”的，周夷王时楚君熊渠伐“江上楚蛮”杨粤后，曾封“少子执疵为越章王”。楚之贵族熊挚曾自奔于“夔越”，从蛮俗，史称“芈姓夔越”、“蛮芈蛮矣”<sup>⑫</sup>。这些蛮也被称为“夷越”。所以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春秋时楚成王使人献周天子，天子赐胙，曰：“镇尔南方夷越之乱，无侵中国。”吴越之地的土著人“荆蛮”、“蛮夷”，就是“蛮越”的别称。《逸周书·王会解·伊尹朝献》记载商代初年伊尹受命“为四方令”时，“正东”有“符娄、仇州、伊虑、沤(瓯)深、九夷、十蛮、越沤、鬻发文身”。孔晁注曰：“九、十者，东夷蛮越之别称。鬻发文身，因其事以名也。”《周礼·夏官司马·职方氏》有所谓“四夷、八蛮、七闽”。郑玄注曰：“闽，蛮之别也。”这里的蛮夷就是指的商周时代吴越之地的土著人，是“蛮越”的别称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说“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句吴。”《索隐》注曰：“蛮者，闽也，南夷之名；蛮亦称越。”因此，“荆蛮”就是“蛮越”之别称，就是越族。

第二，太伯、仲雍所奔之“荆蛮”，就是“断发文身”的越族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太伯、仲雍“二人亡如荆蛮，文身断发”。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又说“太伯、仲雍二人乃奔荆蛮，文身断发”。这就说明他们二人所奔之“荆蛮”是以“文身断发”为特征的土著人。这种特征正是虞夏以来越族人的基本特征。《史记·越王句践世家》明确记载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越时“文身断发，披草莱而邑焉。”《史记·

太史公自序》又说：“少康之子，实宾南海，文身断发，鼈鰐与处，既守封禹，奉禹之祀。”这种“文身断发”，是越国土著人的特有习俗，也是他们族属的主要标志。越国人把它定为“国俗”<sup>⑯</sup>。因此，在历史上往往把“文身断发”或“断发文身”作为越族人的独特标志。《庄子·逍遙篇》说：“越人断发文身”。《说苑·善说篇》则说“越文身鬚发”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说：“越，方外之地，断发文身之民也”。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又把“越人鬚（断发）”作为区别于“三苗髽首”、“羌人括领”、“中国冠笄”的特殊之俗。太伯、仲雍所奔之“荆蛮”，是以“文身断发”为特征，不能证明他们与以“断发文身”为特征的“越人”是同族吗？

当然，太伯、仲雍所奔之“文身断发”的“荆蛮”是在太湖地区还是在宁镇地区，还需要继续探讨。但是，我们认为不管是在太湖地区还是在宁镇地区，这个“文身断发”的“荆蛮”就是“文身断发”的越族。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已提供了证据。

据先秦、两汉文献记载，古代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的土著人是“断发文身”的。《战国策·赵策二》说：“禹祖入裸国”。《吕氏春秋·贵因篇》说：“禹之裸国，裸入衣出，因也。”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则记为：“禹之裸国，解衣而入，衣带而出，因之也。”高诱注曰：“裸国在南方，圣人治礼，不求变俗，故曰因之也。”这就说明禹所到的“裸国”有其特俗，禹进入该“国”时曾“因”（依）其俗。这个“裸国”，在《吕氏春秋·求人篇》记为禹南至“裸民之处”。这个“裸国”或“裸民之处”，就是吴地。《论衡·恢国篇》说：“夏禹裸（裸）入吴国。”《书虚

篇》说：“禹时，吴为裸国，断发文身。”《风俗通义》<sup>⑧</sup>注释说：“裸国，今吴郡是也，被发文身，裸以为饰。”这里说的“今吴郡”，即东汉时的吴郡。《后汉书·郡国四·吴郡》下包括“吴本国”、“丹徒”、“曲阿”等县，即包括今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之丹徒县、丹阳县等地区。这说明夏禹时居住在今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内的土著人，是“被(断)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之民，所以被称为“裸国”或“裸民之处”。这个“裸国”与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所说的“瓯骆裸国”之“裸国”同义。“瓯骆”即“瓯越”、“骆越”，吴地之民与越族同为“被(断)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，同有“裸国”之称，说明他们同为越族人。

夏禹时吴地的“裸国”或“裸民之处”的文化，即相当于分布今江、浙、沪等地的良渚文化。这种文化除主要分布于江、浙、沪的太湖地区外，也分布于宁镇地区，向北到达江淮之间。它的绝对年代，经测定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，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这个期间<sup>⑨</sup>。大约相当于唐虞到夏代初期。如果承认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居民是古“越族”，那就应该承认宁镇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古“越族”居民的文化，这一带的良渚文化居民也是“越族”。在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，则是继良渚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文化。句容城头山遗址的第三层为崧泽文化晚期文化层，其中“罐式匣、绳索状器耳等已含有良渚文化的成分”，第二和第一层为湖熟文化层<sup>⑩</sup>。湖熟文化在宁镇地区的绝对年代，约为公元前1540±90年至公元前1195±105年，相当于商代初期至西周初期<sup>⑪</sup>。这种文化，当是商代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“荆蛮”人的文化。但这种“荆蛮”人绝不是不同于夏代“断发文

身”的越族“裸民”，而是越族“裸民”的后裔，不过被称为“文身断发”的“荆蛮”而已。名称虽然不同，但族属则是一个。他们与太湖地区的“越族”居民同一习俗：“文身断发”。自太伯、仲雍奔“荆蛮”、随从吴俗“文身断发”以后，吴国的统治者都与吴国土著人一样“文身断发”。直至吴国最后一个亡国之王吴王夫差，不是还承认“我文身”吗<sup>⑯</sup>？宁镇地区丹徒的春秋末年吴墓中，已经出土了“文身断发”的文物。如出土的鸠杖杖墩末端，塑造的一个裸身跪坐铜人，“胸部、背部、臀部和腿部皆有花纹”；青铜悬鼓环的环座上塑有四个跪坐人像，“额前短发如流海，身上同样布满花纹”<sup>⑰</sup>。这是吴人“文身断发”的实物形象。它证明宁镇地区和太湖地区的吴国土著人一样，都是“文身断发”的“荆蛮族”即“越族”。越族后裔海南岛的黎族过去曾长期保留文身的习俗。他们为什么要文身呢？史载“黎俗，男女周岁即文其身。自云：不然，则上世祖宗不认其为子孙也”<sup>⑱</sup>。古代太湖地区与宁镇地区的吴国土著人都同样“文身断发”，也当是表明他们属于上世越族祖先的后代。

### 三

我们既然认为吴国土著人“荆蛮”的族系同于越国土著人的“越族”，那么他们的族号应该是什么呢？有的同志根据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关于“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句吴”的记述，也根据出土和传世吴器称吴为“工蠶”、“攻敔”等称呼，认为吴国土著的族号应是“句吴”，即应称为“句吴族”<sup>⑲</sup>。我们认为，吴、越两国土著人的族名合称为“吴

越”，同源于“於（于）越（粤）”，是南方“百越”族系中的主要族群。

先从“百越”说起。“百越”之称始于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》，说：“扬、汉之南，百越之际”。高诱注曰：“扬州、汉水之南，越有百种。”《汉书·地理志下》颜师古注引臣瓚曰：“自交趾（趾）至会稽（郡）七八千里，百越杂处，各有种姓”。这些记述，说明古代扬州区域和汉水以南的土著人被中原华夏族人总称为“百越”。所谓“百越”，即“越有百种”，实际上是说有许多种姓。正如《汉书音义》所说：“百越，非一种，若今言百蛮也。”<sup>②</sup>“百越”与“百蛮”同义，“百，言众多也。”<sup>③</sup>这些众多种姓的“百越”主要是因“越”而得名，聚居在中原东南沿海区域，所以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说：“东南为扬州，越也。”这个东南方的扬州区域，一说是“淮海惟扬州”<sup>④</sup>，一说“江南曰扬州”<sup>⑤</sup>。所谓“扬州”之“扬”，也就是“越”的别称，所以“扬，越也”<sup>⑥</sup>，“越，扬也。”<sup>⑦</sup>扬州区域以越国都城会稽（今浙江绍兴市）为中心的江南，是商周时期吴、越两国的统治中心，秦和西汉时设会稽郡。这一带当然是“百越”之地的中心区，吴越两国的土著人都属于蛮越或夷越之人，是“百越”之人的代表。这一带在周代时期，就称为吴越，正如《论衡·书虚篇》所说：会稽郡“周时旧名吴越也。”这个吴越之名，既表明了吴越两国土著人的族名，也表明了吴越是“百越”之一，还反映了他们的共同族源就是於越。

吴越是吴和越两个国号的并称、合称，也是吴越两地和吴越之人的名称。从吴、越形成的历史看，最初当是两个部